

宋桂梅
编著

WEI JIN RUXUE BIANNIAN

魏晋儒学

编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

魏晉儒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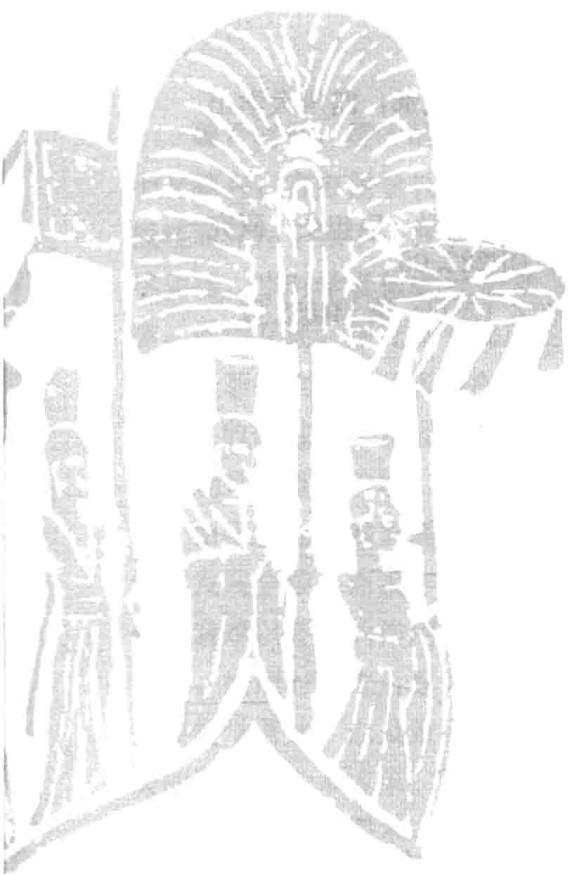
2012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RX12Y03）

2012年度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kq201238）

魏晋儒学

宋桂梅
编著

编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舒 星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儒学编年 / 宋桂梅编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14-7835-6

I. ①魏… II. ①宋… III. ①儒学—思想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858 号

书名 魏晋儒学编年

编 著	宋桂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835-6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绪 论

魏晋时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一个转折期。由于政治腐败、干戈频兴，官方儒学教育受到很大的破坏；门阀兴盛，儒学传授转而深植于家学。玄学风靡，佛教东来，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然动摇。当时学者值此社会动荡、学术转型之际，多以道释儒，佛儒互证，探究儒学发展的新路径。他们在经学研究上，有不少新的创辟，其影响深及唐宋，续至明清，清代《十三经注疏》收编魏晋学者经注就有五部。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一重要阶段。

由于目前的魏晋儒学史研究多偏重专题式或列传式，难窥儒学发展全貌。而编年纪事是中国传统修史方法之一，具有其他体裁难以替代的作用。笔者拟用编年史的形式，从文献学的角度，按照时间先后具体考察魏晋时期儒学人物的学术经历、重要儒学著述，以及重大儒学事件，以期清晰展示魏晋儒学发展的脉络和学术成果。

汉武帝崇明儒术，立五经于官学，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教育内容，被广泛传习，儒学也主要以经学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经学仍是官学、家学和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学在此两百年间由于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道、佛学术思潮的影响，其学术发展又别具时代特点。笔者将在下文对魏晋时期的儒学教育、经学发展及儒学与道、佛关系作一简述。

一、魏晋时期的儒学教育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代统治者、学者对儒学教育都非常重视。魏晋时期，无论是官方学校、门阀家族，还是私人设帐授徒，经学都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魏晋时期的官方儒学教育

魏晋时期的官方儒学教育，主要由太学、国子学和地方州郡学承担。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长安立太学后，儒家经典便成为太学、地方郡学的教授内容。魏晋时期，虽然玄学兴盛，但官方学校仍然遵循两汉的传统，以儒家经学为教授内容。汉末大乱，中央太学教育失序，至曹魏立国，始恢复太学，选聘经学博士，置课试之法，然“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①西晋初年，承曹魏旧制，中央立太学教育诸生，郡县令置小学。咸宁年间，晋武帝整顿太学，增置国子学。东晋诸帝偏安江左，南北时有征战，政局不稳，加之“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②，太学中的儒学传授时断时续。

地方州郡学主要由地方官员主办，学校因到任官员的儒学素养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曹魏时，出生世家的杜畿为河东太守，署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以教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裴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64年，第420页。

② 沈约：《宋书》卷一四《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63页。

后学，此后，河东遂多儒士。东晋大儒范宁十分重视儒学教化，每出任地方官即以讲经兴学为务，抵制虚浮学风。他任余杭令，则在县兴学教育诸生；出为豫章太守，则在郡大兴庠序，并取郡中大族子弟课授五经，又“改革旧制，不拘常宪”^①，远近至者数千余人，南朝刘宋时期的名儒周续之就曾在豫章郡学中从范宁问学。庾亮出镇武昌，开置学官，广延儒者，但亮卒后，学校旋废。可见，地方郡学的发展具有不稳定性。

总之，魏晋时期官方儒学教育随官方学校的沉浮不定而少有发展。帝王虽有讲经视学之举，但因政治环境恶劣，其关注力度不够；有识之士虽不断上疏建言崇儒重学，但因社会动乱，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作保障，官方学校时兴时废，没有长久安稳发展的时机，加之世尚老庄的学风影响，官方儒学教育成果甚微。

魏晋时期立于官学的各家经说和太学博士人数，前贤时彦已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可资参考。通过编年考察，曹魏正始六年（245），王朗已逝，但其《易传》得立太学。王朗《易传》虽佚，但从后来学者的传习和评论推想其《易》学成就不会十分高明，至少不足与郑玄并驾齐驱。王朗《易传》之所以得立官学应该是当时郑（玄）、王（肃）学术之争的影响所致。由此一例可以窥见政治力量对官方教育的影响。另据学者考证：魏时何晏等人所注《论语集解》曾短暂立于学官；又西晋中后期，玄风炽盛，王弼所注之《易》已取代王肃之《易注》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8页。

而立于学官。^①可见，学术的进步和时风流俗也在影响着儒学教授内容。

（二）魏晋时期家学中的经学传承

魏晋时期，官学不振，家学尚有可观。钱穆先生即言：“政治虽颓废不振，在民间则仍保有文化与学术之传统，并能自有创辟。”^②

汉代通经致仕，出现累世公卿，门第始兴。魏晋时期，朝代更迭，动乱不已，门阀家族却有盛无衰，而一个家族的兴盛衰亡与子弟教育密切相关。《颜氏家训》载：“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③经学和儒学教化乃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不少家族在经学传承中，经过几代人的学术积累，形成专精的家学，世代相习，如荀氏《易》学，贺氏《礼》学等。陈寅恪先生有言：“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④可见魏晋时期家学在学术发展，尤其儒学传承中的地位。

大族盛门重视子弟礼仪教化、家学传承自不待言，如三国

① 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③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1页。

④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

吴郡范平以儒学授三子，其子“并以儒学至大官”^①。晋人刘殷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东晋谢安出仕之前，常集家族子弟论学，女性后辈如谢道蕴也能参与其中。普通民众家庭也期望有佳子弟出现。晋人皇甫谧，从其嗣母之训，问学乡人席坦，勤学不怠，终成一代经史之才。前秦时期韦逞的母亲宋氏，昼则樵采以维持生计，夜则亲授韦逞《周官》，以不废其学。

家族儒学传承中父子同研一经，均有经学著述问世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王朗、王肃父子注《周易》，王接、王愆期父子注《春秋公羊传》，李充、李颙父子之注《周易》《尚书》。这种家族学术积累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女性在家学传承上也非无功可书，如前述韦逞母宋氏出身儒学世家，及长，学习《周官》音义，并于丧乱间讽诵不辍。后以《周官》传授其子韦逞，韦逞得仕前秦为太常。宋氏又得前秦君主苻坚赏识，在家设帐授徒，使《周官》学复兴于世。

（三）魏晋时期私学中的儒学传授

与家学传授相比，名儒收徒授学则是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儒学的教育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颓废，部分学者不愿出仕而乐于隐居教授；另一方面，战火纷扰，官学驳杂，学子也多愿拜名儒为师，从私馆就学。

私学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其间既有启蒙性质的传习，又有加深造诣的研习，同时也积极探索学术和教育，或学问自成一家，或教育方法别具一格。如汉末郑玄学问自成一家，生徒甚众；又平原人王烈，“其诱人，皆不因其性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皆成实器。门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一《范平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7页。

人出入，容止可观”。^①

部分私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晋人刘兆受业生徒数千人；杜夷年四十余，返乡闭门教授，生徒亦有数千。在少数民族统治辖区内，留在北地的学者们也在积极收徒授学，弘扬儒学。晋人宋纤隐居酒泉南山，“弟子受业三千余人。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② 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③，后被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④ 后秦治域内的姜龕、淳于岐、郭高等皆耆老硕德，经明行修，在长安教授，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

学者设馆授徒也带动了游学之风，此一时期的大儒在其学术成长的过程中，不乏游学经历。三国时期的邴原，游学各地，师事多人，先问学安丘孙崧，后“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⑤ 归故里后，教授门徒，青州遂有郑、邴之学。蜀人尹默、李仁游学荆州，习古文经，学成后在蜀地传授。晋人董景道千里追师，学通“三礼”，后以郑玄为宗，并著《礼通论》演广郑旨。

私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使儒学传承后继有人；学者各地游学，寻师问道，增广见闻，切磋学问，既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也加强了地域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区域儒学的发展兴盛。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裴注引《先贤行状》，中华书局，1964年，第355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四《宋纤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53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四《祈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56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四《祈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56页。

⑤ 陈寿：《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邴原传》裴注引《邴原别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352页。

（四）少数民族统治区内的儒学教育

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各少数民族首领忙于战争杀伐，抢占领土，其民族又不若汉族地区有习礼乐文化之传统。但观史书记载，各少数民族政权均有兴学崇儒之举，儒学传授并未被完全阻绝。这一方面应归因于儒学具有强大的治世功能，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留在北方的众多儒者对儒学文化的积极弘扬，他们或配合少数民族统治者兴办儒学教育，或巩固门庭，儒学传家，或收徒授学。此一时期，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南燕、西凉、南凉、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及汉人建立的前凉、北燕等政权，不管地域如何狭小、存在时间如何短暂，都曾优礼儒者、兴办教育。十六国政权中，后赵和前秦政权兴办儒学教育最为积极，在此恕不赘述，可详见编年正文。十六国时期，在各少数民族政权中，庠序未废，诵读经典之声并没有被战争杀戮之声淹没。留在北方的士子得以继续研习儒家经学，少数民族人民也得以披沐仁义礼让之雨露。此时，北地经学也有所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与南方不同的学术风格。东晋人褚裒和孙盛曾论及南北学风，认为“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①。

总之，魏晋时期，无论是官学还是家学、私学，都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儒学传承和经学研究并未废弃，而是在家族和私馆之中得到教授传承，持续发展，异彩纷呈。

^① 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中华书局，1983年。

二、魏晋经学文献的特点

经过编年考察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儒家经学发展自有创辟，影响深及后世。社会的剧烈变迁促使当时学者重新审视旧有的意识形态及其学术表现形式，选择了新的学术取向，使深受繁琐章句和讖纬依附所困的经学研究柳暗花明，别见洞天。

集解式注经是魏晋学者对两汉及当时新出经学成果批判吸收的总结性研究。魏晋经学破除两汉以来严守的家法、师法壁垒，不再囿于经学内部的今古之争；学者研习儒家各经，视域宽泛，注重汲取前人所长和时人见解，并兼取非儒学典籍用以互证。在汉代各家经典训解的基础上，魏晋学者一方面汇集整理了前人注经成果，另一方面又通过注经阐发自己的思想，丰富和提高了经学训注内涵。

此一时期，儒家各经均有集解体经注问世。《论语》类有曹魏时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易》类有西晋张璠博采前代二十二家易说的《周易集解》，《春秋》类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东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尚书》类有东晋李颙《集解尚书》，《礼》类有东晋孔伦撰《集注丧服经传》，《孝经》类有西晋荀勖《孝经集议》。更多可详见编年正文。集解体释经一改汉代固守师说、家法之传统，博采诸说，择善而从；复受时代思潮影响，援道济儒，注重义理阐发。经过编年考察，魏晋时期集解《论语》和《春秋》二经的著述较多，水平相对较高，如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三部均为集注。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等人所著《论语集解》乃“集诸家之

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①的汇通之作。“集诸家之善”乃何晏等人博采汉魏之际《论语》古注；“颇有改易”则为自述己意；首席作者何晏为正始名士，玄谈领袖，改易处不乏以道释儒之新论。《论语集解》名重当时，留声后世。钱大昕曾评曰：“自古以经训专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②此时期其他集解《论语》的著述还有江熙的《论语集解》（十二卷）、卫瓘《集注论语》（八卷）、崔豹《论语集义》（八卷）、孙绰《集解论语》（十卷）等。值得一提的是应琛的《论语藏解集》，此书已佚，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梁有《论语藏解集》一卷，应琛撰，亡。应琛始末未详。按：‘论语藏’之名不可解，似有脱文，疑是‘行藏集解’，落‘行’字。”^③

魏晋时期，《春秋》学的研习者多是三传兼修，出现三传合流注经方式。晋人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故作《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④。又汜毓合《春秋》三传为之解注。学者不再因经今古之不同而互相固守、攻讦，转而于《春秋》三传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此一时期，《春秋》学集解成就最大者当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氏将《春秋》与《左传》按年相配，经、传集释，改

①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何晏论》，《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

④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一《刘兆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0页。

变了汉魏以来经、传单独流传的状况。杜预虽专修丘明之《左传》，但在集释的过程中也多借引化用《公羊》《谷梁》注说。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成于众人之手且广集博采前人成果，此外该书《春秋》三传兼引，不局限于前人《谷梁》注，更不曲护《谷梁》之短；同时，范宁也颇为重视同时代人的观点，书中多次征引徐邈、江熙等人的见解。杜、范二氏之学，深为后世推崇，影响甚深。

与两汉经学相比，援道释儒、注重经义阐发是魏晋经学另一特点。汉儒解经重章句训诂，动辄一经解说百万余言，间有讖纬所附，略显荒诞。汉末荆州官学首开新风，注经以简化繁，注重义理。魏人王肃注经秉承荆州学派遗风，进一步以简化繁，并具有儒道兼融的学术倾向；随着玄学的兴盛，学者多儒玄双修，注经以道释儒，以道家哲学思想资源补充儒家经说的不足，为儒学的发展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这种学术研究理路的转变在何晏、王弼、郭象等学者的经学著述中多有体现，前人已有相当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另外，魏晋学者在注重经说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经学的研究领域。三国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从博物学的角度注释《毛诗》；晋人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更是丰富了《春秋》学的研究内容。

三、魏晋时期儒学与道、佛学说的论争和会通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时人纷注《老》《庄》，道家学说风行；同时佛教自西域而来，适逢乱世，信徒日增。儒学虽经两汉发展，已深嵌于社会之肌体，但因失去强大的政治势力作保障，其唯我独尊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护自身的正统地

位，儒家学者除正面阐述发掘儒家学说的治世功能外，同时也必然要应对来自道、佛思想的挑战。而儒与道、佛二家学说都自成体系，思想及表示方式各不相同，加之社会现实因素影响，儒学与道、佛之间在此一时期既有论难纷争之局面，又有会通融合的领域。

（一）儒、道间的纷争会通

道家形成于先秦时期，其后逐渐发展成一个以老、庄思想为主的哲学流派。西汉初年，上层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黄老思想得以发展。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崇尚儒术，并将五经立于官学，道家发展受到抑制。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儒家的治世功能不足以安抚士人的心灵。加之政治腐败，儒家名教异化，时人遂转向道家之学，以偿儒学之不足，遂致学风大变，玄风四起。而儒、道思想各成体系，且在自然、人生、政治、伦理等思想方面存在差异，故此一时期儒、道间纷争之剧可以想见。通过编年考察，魏晋时期的经学家多是儒、道兼修，既注经又研道，如曹魏时期何晏、王弼，西晋向秀、郭象，东晋李充等。故此时儒、道间的纷争融合可在当时学者的辩论、言行、著述中窥见一二。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言意关系的不同解答在魏晋时期再次引起学者的关注。《周易·系辞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而《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否定了语言在传达思想上的功用，认为“意不可言传”。汉末魏初，时人在品评人物和鉴识才情时，再次引发了对言意关系的思考。随后，这种思辨扩展到经学诠释领域。魏太和初

年，荀粲“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而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粲兄侯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①荀粲好道，是本着道家“言不尽意”的思路来诠释儒家经典的，认为“象”“言”未达《易》理，《易》理实蕴而不出，是以否认六经的文本作用，进而质疑儒家名教的纲常礼仪。但“荀粲的‘言不尽意’论，显然是取先秦老庄道家的观念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开创了综合儒道的学术倾向”。^②时至王弼，先肯定了“圣人之意”是可以通过诠释经典而获知的，即“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③。又化用庄子“得意而忘言”之说，以“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方法诠释《周易》，解决了荀粲“象外之意，系表之言，蕴而不出”的问题，并将这种释经方法用之于《论语》等经典的训释中。这种新的注经方法实是从认知事理的方法论上借道释儒，融合儒道。

然而“忘象”“忘言”之论随着玄风的兴盛和“贵无”思想的风靡，却为时人夸大言意矛盾、口谈浮虚、以“不言”“裸裎”为尚的行止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此，欧阳建起而著《言尽意论》，指出“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何劭《王粲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319页。

② 高晨阳：《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齐鲁书社，2000年，第132页。

③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欧阳建的论著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言”在识理辨物上的功用，使圣人之说不至流于虚妄。他的这次总结，“不仅差不多结束了中国思想史上‘言意’之辩的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基本抽空了清谈玄风在认识论领域的基石，捍卫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为儒学在魏晋儒道纷争的过程中重振河山助了一臂之力”。^①

儒家崇有，重礼教；道家尚无，贵自然，相互对立。魏晋时期在有无、自然名教的辩论中，学者通过注释《周易》《论语》等经建立以“无”为本的认识论体系，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融合儒道。曹魏正始四年（243），王弼与裴徽初见，所讨论的就是关于孔圣与老子的有无之学。裴徽时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② 这里裴徽的设问前提“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应该是当时裴徽、何晏及王弼等学者关于本体论认识的共识。而为何圣人对这一万物之本却不言不说呢。王弼认为圣人也是体无主义者，只是“无”无法加以训说，实与老子意旨相同。随后他又通过注释《周易》《论语》，阐述儒家名教出于道家自

①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73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795页。